

#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差异化认同： 原因、风险及启示

张 赛 群

**提 要** |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差异化认同存在于不同界别、领域、群体和年份，主要分为关注程度的差异和认知态度的差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与人们的需求、经历及宣传等有关，后者与马来西亚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生态、经济利益及民族心理等有关。这种差异化认同使“一带一路”在马推展存在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的风险，因此需要倾听各方声音，加大有效宣传和解释，理顺各方利益，最终化异为同，实现“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民心相通”。

**关键词** | “一带一路” 认同 差异化 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

**作者信息** | 张赛群，1975年生，博士，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教授，362021。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战略要冲，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与节点国家。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马来西亚的态度整体上趋于积极和正面，这也使得学界更为关注“一带一路”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反应，对马来西亚的研究成果<sup>①</sup>相对较少。然而，马来西亚国家内部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是存在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使得中马“一带一路”合作在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质疑中马合作目的、指责中资发展方式以及中资收购遭遇“滑铁卢”等事件，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乃至整个东盟地区的推广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认识这种差异，并最大程度地化解这种差异。由于已往的研究成果或关注某一群体的反应或整体上研究马来西亚积极响应背后的原因，对马来西亚各界于“一带一路”的回应及其差异性还缺乏系统分析。因此，本文欲对这种差异性及其原因、风险等进

行初步分析，并为化解这种差异性提出自己的思考。

## 一、马来西亚“一带一路” 认同差异化表现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马来西亚反响较大，态度整体上也趋于积极和正面。但细究起来，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不同界别的关注度和看法不同。对“一带一路”表现最为积极的是政界和商界。在政界，2018年5月重新组阁前，马来

<sup>①</sup> [马来西亚]饶兆斌：《经济高于地缘政治：马来西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马来西亚]骆立：《马来西亚华社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从〈星洲日报〉考察》，《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4期。

西亚领袖包括总理、交通部长、旅游部长等多次明确表达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态度。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不仅多次表示马来西亚必须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还委任前交通部长江作汉担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华特使。在出席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纳吉布高调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将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变化,并发表题为《马来西亚为何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署名文章。2017年底,纳吉布公布了该国2017—2018年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商机被载入其中。交通部长廖中莱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十分热心,他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马来西亚的积极意义,并认为马来西亚是中国进入东南亚和其他邻近区域市场的跳板和协调者,即强调了“一带一路”中马合作的必要性。一些马国官员还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如2016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对华事务特使黄家定提出,中马两国的仲裁合作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争端,体现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

当然,政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由于“一带一路”提出后,中马两国政府来往密切,特别是和纳吉布的关系走得很近,引起了部分反对党的抨击。抨击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中马两国基础建设合作项目是否涉及腐败,马执政当局是否从中获利?(2)在中马经济合作如此紧密的情况下,马来西亚能否维护其南海权益,甚或会出卖主权?<sup>①</sup>(3)指责中资涌入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4)担心中国会增加“丝路”上的军事力量。

对马来西亚工商界而言,“一带一路”更像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倡议,他们从中看到的是商机和市场。为此,中马企业界进行了多次“一带一路”联合研讨,与会者主要对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话题展开探讨。2018年2月,中马中小企业合作对

接会在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商界人士对“一带一路”也多持肯定态度。2016年马来西亚“一带一路”总商会成立,旨在加强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

马来西亚学界和智库总体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表示支持。如在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兼职的法立诺用“务实性的现实主义”来阐述他对新“丝路”精神的理解,认为新“丝路”立基于人民日常生活上的交往、互动和合作。同在该所任职的沙里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沿线国家。<sup>②</sup>学者们还对马来西亚如何应对提出建议。如马来西亚海洋研究所的苏玛蒂·珀马尔认为,马来西亚应将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协调好,并制订国际层面和地区层面的计划,以促成与中国共同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sup>③</sup>当然,相比政商两界,学界的观点更为审慎,他们在关注“一带一路”给马来西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挑战,并提出了马来西亚如何从中受益的问题。<sup>④</sup>一些学者还对“一带一路”的可能后果表示担忧,如担心中国会增加在21世纪上海丝路的

<sup>①</sup> Adrian Wong, “We Fear for Nation’s Sovereignty, Not Votes, MPs tell Salleh”,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62039#ixzz4Q3fQ11RQ> [2016-11-08]; 玛丽安:《大马成为中国最新一个省?》,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61175> [2016-11-01]; DAP: Najib’s Dependence on China Putting Country at Risk, *Free Malaysia Today*, November 1, 2016.

<sup>②</sup> Shahriman Lockman, the 21st Century Mraitime, Silk Road and Ching-Malaysia Relations, *ISIS Focus*, May 2015, pp. 1-5.

<sup>③</sup> 《马来西亚学者:“一带一路”将使中马实现双赢》,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7/0503/1953846.shtml>. [2017-05-03]

<sup>④</sup> 《马研究员:“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的意义》,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23/doc-ifyhmpew3162824.shtml>. [2017-06-23]

军事存在,①担心新丝路的成功会给东盟的凝聚力造成负面影响,②担心马两国投资贸易活动剧增后的法律摩擦问题,等等。

马来西亚媒体最关注“一带一路”的还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媒体,马来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和评论整体偏少。媒体人士倾向于给“一带一路”正面评价,如马来西亚著名时评人伽玛鲁丁认为,这一倡议不仅为马来西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还将为全球经济振兴带来新机遇。③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在政商两界反响最大。2018年5月重新组阁前的执政党和政府倾向于认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及其于马来西亚的积极意义,反对党则因当局与中国走得太近,担心主权难保及政府腐败等问题;学界多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对马来西亚如何应对及“一带一路”的可能后果有所质疑;工商界更为关注“一带一路”的经贸层面,也多从经济利益出发持肯定态度;华文媒体对“一带一路”较为关注,但马来媒体对此缺乏足够兴趣。可见,不同界别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程度和重点不同,态度不一。有些界别虽然关注度相似,但态度也有差别。

其次,对不同领域的认同度有异。以对“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热心的华人社会为例,根据马来西亚学者骆立的观察,华人对中马经贸往来的回应最为集中,占68.0%,其余依次是文化交流(19.2%)、政治(11.7%)、学术(0.8%)等方面的问题。这在华人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实施途径(即“五通”)的回答上也得到了印证,超过一半的回应是关注贸易畅通,其次是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而从态度来看,华人社会对民心相通、贸易畅通和政策沟通持赞成(包括很赞成和赞成)态度分别是96.1%、80.8%和57.8%。④可见,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很关注经贸层面,但更赞成文化层面。而相对于民心相通和贸易畅通,华人社会对政策沟通的认同度更低。再从质疑的内容来

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更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和落实问题,在“五通”方面,贸易畅通的疑问占61.7%,民心相通占23.5%,政策沟通占11.6%,其他设施联通、金融流通各占2.5%和0.6%。⑤整体而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更关注贸易、文化和国家管理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再次,不同时间的关注度和看法不同。整体上,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马来西亚各界对“一带一路”关注度明显提升,这可能与这次会议的高规格及纳吉布的高调表态有关。同时,不同时间马来西亚民众对同一事物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如中资在马来西亚的争议约在2016年12月底爆发,之前较少发生。2016年之后,因中资大举进军马来西亚房地产、铁路、港口等重要领域,引起马来西亚反对党的关注,并抨击纳吉布典当国家主权。马来西亚华社也有类似表态,随着中资的不断涌入,华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在逐年增加。这可能与华人从商较多,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有关。无论如何,这表明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是动态的、发展的,也是愈益慎重的,人们在受益于“一带一路”机遇的同时,也在思考可能带来的挑战。

① [马来西亚]饶兆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安全关系初探》,《中国评论》2016年第2期。

② Shahrman Lockma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ISIS Focus*, May 2015, pp. 4-5.

③ 赵胜玉:《马高度评价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http://news.sina.com.cn/o/2017-05-15/doc-ifyfevz1440946.shtml>。[2017-05-15]

④ [马来西亚]骆立:《马来西亚华社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从〈星洲日报〉考察》,《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4期。

⑤ [马来西亚]骆立:《马来西亚华社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从〈星洲日报〉考察》,《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4期。

## 二、马来西亚“一带一路”

### 认同差异化原因

如前所述,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差异可以分为关注程度的差异和认知态度的差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与需求、经历及宣传等有关,如马来西亚政商两界之所以对“一带一路”更为关注是因为他们对“一带一路”有着自己的需求,即便这一需求是为了使自身利益不受“一带一路”的干扰;而有着在华经商或参政经历的人倾向于更关注“一带一路”。

至于认知态度的差异,主要有倾向于赞成和倾向于反对(含质疑)两种。前者可以从历史传统、经济诱因和政治需要等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 历史传统。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中马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到了当代,马来西亚鉴于本国市场狭小,吸引外资、发展国际贸易一直是其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开始关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1985年11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首度率团访问中国,签署了多项贸易、投资和运输协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更是大幅调整其对华政策,清除双边交流合作的各种障碍,以促进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密切合作。“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一个扩大区域经贸合作的倡议,而吸引中资、与中国广泛开展经贸合作的一贯做法决定了马来西亚整体上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予以正面回应。

2. 经济诱因。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地

① 安焕然:《大马评论:“一带一路”要留意的几件事》, <http://wtoutiao.com/p/4f8nlgf.html>。[2016-10-06]

② [马来西亚]饶兆斌:《经济高于地缘政治:马来西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最后,不同族群的认同度不同。马来西亚是多元族群国家,不同族群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度并不相同。目前,马来西亚华人对“一带一路”更为关注,态度也更为积极,成立了100多个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团体,关注与“一带一路”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华商表现得尤其突出,成立了多个旨在呼应“一带一路”的团体,如2016年成立的大马“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马中丝路商会”、“马来西亚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等。2015年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出版了《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与世界联通时代的马来西亚》一书,系统阐述了中马两国“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2017年,“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还拍摄了《“一带一路”一家人》大型专题片,以做好民心相通的工作。华人政党——马华公会近年来不仅主办了多次“一带一路”研讨会,2016年12月还成立了“一带一路”中心,旨在帮助马来西亚工商界把握合作发展契机。同月,马华公会还与众多华人社团在吉隆坡共同签署《马来西亚华社一带一路宣言》。相比华人社会的热闹场面,至今马来社群的报章还将“一带一路”译成“Satu Jalur, Satu Laluan (China)”,也就是说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见马来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还是相当生疏和片面的。①

在认同度方面,根据2016年马来西亚学者饶兆斌进行的相关民意调查,在问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时,华人多给予正面回答,其次是马来人,印度人只有约12%赞成这一看法。同时,华人也是最认同中国对马投资的,持“同意”和“非常同意”观点的有78.8%,是各族群中最高的。②这或许表明,文化或种族因素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马来西亚虽然整体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较为认同,行动也较为积极,但实际上其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也是朝野有别且官商异趣的。

缘政治观念相对淡薄,大部分人倾向于从马来西亚自身利益层面尤其是从经济利益层面来考虑是否参与“一带一路”。这与印度等大国明显不同,印度倾向于更多地考虑在印度洋领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因而一直对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持谨慎态度。而在马来西亚,即便是巴生港、槟城港等位于反对党执政的州,州政府并没有因为原执政党和中国关系密切而采取抵触中资的做法。可见,人们更关心的是能否在“一带一路”中获得实际利益。而目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马来西亚国家发展目标有高度的互补性。在马来西亚第11个发展计划里,政府正积极推动港口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整合的内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资金支持,以及中国在高铁、通信网络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实力,使得不少马来西亚政商人士确信“一带一路”可以帮助马来西亚实现其发展宏图。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目前马来西亚对中国市场也比较依赖。至2016年,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新加坡;进口市场则稳居第一。此外,中资涌入对于马来西亚解决就业、引进技术以及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均有所帮助。如根据马方贸工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在马投资的191个制造业项目为2万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预计未来,33个中马合作项目会再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sup>①</sup> 总之,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中国对马来西亚经济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也因为如此,即便是之前作为反对党领袖的马哈蒂尔,在2018年5月10日大选获胜后也表示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3. 政治需要。2016年,全球经济动荡对马来西亚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是年,马来西亚国内遭遇石油价格走低、国内消费不振、货币持续贬值等多重压力,加上“一马公司”丑闻<sup>②</sup>曝光,使得2018年5月重新组阁

前的总理纳吉布带领的执政联盟面临政治信任危机。面对反对党不断的批评以及2018年5月的全国大选压力,加大吸引外资(尤其是中资)力度就成为纳吉布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困境的重要“法宝”。加之原执政联盟中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的极力怂恿和从中协调,使得整个执政联盟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趋于乐观。

而对于马华公会而言,“一带一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马华公会在过去两次全国大选(2008、2013年)表现不佳,其传统票源(华人票)绝大多数投向反对党,这也导致它在执政联盟内的地位不如从前。因此,马华公会希望凭借“一带一路”中充当中马两国合作的急先锋和两国商界联系的重要桥梁,增强其在执政联盟内的地位。

另一方面,反对或质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虽然中马两国均从中马合作中受益,但两国相对收益的差距仍然使一部分马来西亚国民产生不满情绪。一些被认为与中企的投资方式有关。如到马来西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多为大型企业,财力雄厚,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的项目也较多。这些企业习惯于“一条龙”的输出模式,包括原材料、技术人员等,很少聘用当地人才,难免引起人们对马来西亚民间中小企业被“挤出”命运的担忧,以及对马来西亚真实获利的质疑。经济利益的冲突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华商而言也是如此。同时,华人也是各族群里与中国经贸来往较为密切的群体。来往得多,摩擦也多,因此华商难免有所担忧。

<sup>①</sup> 《马研究员:“一带一路”对马来西亚的意义》,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23/doc-ifyhmpew3162824.shtml>。[2017-06-02]

<sup>②</sup> 2015年“一马公司丑闻”爆发。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揭露,疑似一马公司的7亿美元资金辗转汇入纳吉布的私人银行账户。但纳吉布指这笔巨款是沙特王室捐给巫统的政治献金,并强调他未曾把钱花在私人用途上。

近年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的项目也备受指责。马来西亚国内一贯对华人资本与政府合作采取“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即公司股权必须保留给马来土著统治集团。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种模式因中资大举进入而受到冲击。尤其是在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2015年初把旗下电力公司EDRA的全部股权售予中国广核集团,并决定将大马城60%的股权售予依海中铁财团(即ICSB财团,内中铁集团出资40%)后,更是引起反对党对纳吉布接受中国“金援”的质疑。总之,基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近年来马来西亚对中资的质疑声音愈益明显。

其次,与马来西亚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马来西亚实行政党联盟执政的制度,执政通过选举实现,没有选上的称为反对党联盟,其立场自然与执政党联盟不同。因此,当2018年5月大选前的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试图把自己塑造成通过“一带一路”吸引中资救助国内疲软经济功臣的同时,反对党联盟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就可想而知。反对党批判纳吉布,自然也批判纳吉布支持的中国投资。因此,当纳吉布2016年11月与中国签署了总值约320亿美元的投资备忘录后,即被反对党贴上“卖国”的标签。

再次,与马来西亚民众的“大国”恐惧心理有关。尽管自2009年以来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使马来西亚人民真实获益,但毕竟马来西亚是区域小国,且与中方有着南海权益之争,汹涌而来的中资必然使当地人民备感压力,担心过分依赖某一大国会受制于人,最终导致利益或主权受损。这也是有着相似处境的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心理,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在向中国靠拢的同时,又对中国有所提防。

### 三、认同差异化背景下“一带一路” 在马来西亚的实践风险

基于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认同,进一步推进这一倡议存

在如下风险。

1. 政治风险。与东南亚某些国家政权变动频繁、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相比较,马来西亚的政治风险较低,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包括逐渐激烈的党派之争,以及境外势力对马来西亚的影响等。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对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更为看重和依赖,而忽略了马来西亚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以至于中马合作过程中,同马来西亚反对党的直接接触不多,了解也不多。但是,选举政治是不确定的,2018年5月10日马来西亚大选的结果就证实了这一点。随之而来的是,新总理马哈蒂尔叫停新马高铁项目,并表示将对多个中资项目重新谈判。而且,即使是前任执政党领袖纳吉布,在反对党的一片指责声中,2017年5月也提出一切中资投资发展建设项目都应优先聘用马国承包商、采用马国原料产品,以及培训和雇用马国各阶层专业人士或普通工人等要求。因此,与执政党的友好不代表“一带一路”在各地能畅行无阻。而原反对党领袖马哈蒂尔重新执政,更是使得“一带一路”中马合作的政治风险大增。

除马来西亚自身政治势力外,境外势力对马来西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中马关系虽然发展顺利,但马来西亚作为战略敏感核心地带实力较弱的国家,其外交政策也时常受到美国、日本和东盟等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马关系比较关注,倘若美国有意施加影响,则有可能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将来的对华态度。另外,马来西亚奉行以东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倘若“一带一路”真给东盟团结带来负面作用,那么马来西亚决策者也会为此感到忧虑。类似的担忧也存在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成员国。

2. 经济风险。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持续升温。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对马来西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4.08亿美元,同比增加

237%。2016年,中国更是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截至2017年6月,马中签署的合作项目总金额已超过400亿美元。<sup>①</sup> 尽管中马经济合作呈现良好态势,但中资企业走进马来西亚也有一定的经济风险。如2017年5月,马来西亚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私人有限公司(TRX City)以合作方未完成付款为由,使前述依海中铁财团对“大马城”项目注资60%股份的协议失效,尽管ICSB声明已完成付款,但马国政府不予受理。这预示着中铁集团入股大马城失败。其后,万达集团与纳吉布在北京会面时表示有兴趣投资,然而纳吉布返国后立即宣布马方将持续百分百持股大马城。不仅中资进军马来西亚受挫,一些产品输出也面临反倾销调查。如中国对马输出的钢材因与马国生产的钢材形成直接竞争,2015年4月马来西亚对原产于中国的冷轧不锈钢板以及彩色涂层钢卷进行反倾销调查。马方还决定,从2015年7月始,对自中国等42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热轧中厚板征收三年保障措施税。可见,中资和中国产品进军马来西亚之路也充满崎岖。即便是已进军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也存在经济利益上的风险。如马来西亚槟城二桥由中国公司承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马方坚持改按英国标准设计,但造价不变,无形中加大了中方获利风险。即便是借贷给马来西亚政府,倘若投资失败或是政权更替,也面临着债务能否如期偿还的风险。

3. 种族矛盾风险。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是主要的民族。2016年,华人人口为664余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3.4%。总体而言,马来西亚各民族相处和睦,不存在类似印尼那种大规模种族冲突的风险,但对华人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存在,典型如华人难以进入政治决策高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华人政党及华社与中国的联系明显加强。如马华公会2014年7月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合作交流备忘录,开启了两国政党的密切合作,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两党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协调下,马华公会与中国经济联络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带一路’中国—马来西亚工商界对话会”。之后,马华公会在马举办了一系列“一带一路”相关研讨会或企业对话会。马华公会的上述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一带一路”的作用,但这种紧密的合作又是有风险的。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一贯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关系保持警惕态度。近年来,一个名为“跨学科研究和国际战略”的马来西亚民间智库,在其网络刊物上散播“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通过海外华人渗透他国国内政治做法的观点。<sup>②</sup> 因此,倘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政党与中国政府或中资企业走得太近,有可能会在华人问题仍然敏感的马来西亚再次引发中国干涉内政或华人“效忠”的质疑,甚至可能演变为种族问题,最终不利于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并有可能对中马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可能性应该说在华人问题相对敏感而华人人口又比较集中的东南亚国家是普遍的。

总之,马来西亚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也是将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国家。然而,在马来西亚国内对“一带一路”存在认同差异的情况下,机遇与风险同在,中国方面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并及时应对。

#### 四、马来西亚“一带一路” 认同差异化的启示

如何最大程度地化解中马合作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继续推进中马“一带一路”合作,

<sup>①</sup> 威易斌:《“一带一路”写入马来西亚年度经济报告中马合作潜力巨大》,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7-10/31/content\\_41818408.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7-10/31/content_41818408.htm). [2017-10-31]

<sup>②</sup> Asyraf Farique, China Dream, One Belt One Road (OBOR) dan Peranan Diaspora Cina, <http://focuss.my/china-dream-one-belt-one-road-dan-peranan-diaspora-cina/>. [2016-10-07]

我们可从马来西亚“一带一路”认同差异化中得到若干启示。

首先,倾听各方声音,减少“一带一路”推进阻力。如鉴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马合作的长期性,中方要以适当方式加强与马来西亚各政党的对话与沟通,以应对马来西亚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在2018年5月马来西亚重新组阁之后显得尤其迫切;相比其他群体,学者们的观点更为客观和慎重,也看得更为深远,为了把握中马合作的深层次问题,有必要多听听中马学界的观点;又由于马来西亚民意影响着选票,因此要多进行中马合作过程中具体问题和对策的民意调查,为中马合作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其次,应加大“一带一路”有效宣传,增进共识。目前马来西亚民间不仅对“一带一路”了解不多,而且存在较多误解,因此中方应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重点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的自愿、平等参与及其互利、共赢宗旨,解答马来西亚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种种质疑。当然,宣传时要讲究技巧,注重宣传的有效性。如通过当地华社、学者或曾经有在华投资经历的人宣传就比中方尤其是中国政府出面宣传更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因为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宣传,才使得马来西亚华人相比其他族群而言对“一带一路”更为了解。另有着在华经商经历的人不仅更了解中国经贸政策,而且也因参与中马合作而受益,其宣传更能收到现身说法的效果。今后,仍需更多地借助马来西亚民间力量宣传“一带一路”,通过宣传打消马来西亚各方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促进中马“民心相通”。

再次,重视风险评估,尽可能规避风险。如中国方面需要更多地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种族心态等因素,在利益与风险评估中做出理性选择,摆脱被质疑及失利的风险。如鉴于目前马来西亚民意对两国经济合作的认同度远高于两国“政策相通”

的必要性,中马合作可以采取先经济后政治的步骤逐渐实现。况且,目前中马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马来西亚民意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又并不排斥,因此经济合作的成效也将更为明显。而在政治层面,受制于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等,马来西亚民间对与中国“政策沟通”的认同度仍相对较低,要改变这一现状非短期之内可以实现。又如与华人的合作,由于华人问题在马来西亚仍然比较敏感,华人的“海丝”热情可能会令当地民族反感,因此中国不宜过分强调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作用,也不宜仅与华人合作,那样容易使人误解,甚至可能给华人造成困扰。

最后,改善合作方式,力争取信于民。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尝试多种合作方式。官方合作虽然短期内能使中资大规模进入马来西亚,但鉴于当前马哈蒂尔对中方审慎态度,以及民间对中资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的种种质疑和负面评价,可以着力探索官民合作、民民合作的形式,规避政治、经济风险。(2)深化合作领域。除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建设以及物流运输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外,中马应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合作交流,加强中小企业的参与,让更多的人受益。甚至中马应加强“一带一路”上的安全合作,这样更能使马来西亚民众放心。(3)转变中资发展方式。更多地与当地企业接轨,雇佣当地人才,采用当地原材料,真正融入当地,否则易因没有惠及各方而引起当地企业和民众的不满,使中企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概言之,中马合作要想持久,必须全面贯彻互利共赢的原则。

总之,平衡好中马各方利益,广泛惠及马来西亚民生,是化解当前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差异化认同的根本所在,也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中马合作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高媛)